

齐泽克文集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齐泽克文集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i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

郭英剑 等译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斯洛文)
齐泽克(Žižek, S.)著;郭英剑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05.6

(齐泽克文集)

书名原文: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ISBN 978-7-214-04640-6

I. 因… II. ①齐…②郭… III. 齐泽克, S. -哲学思想

IV. B5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73675号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

Copyright © 2002 by Slavoj Žižek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07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The Imprint of New Left Book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3-029

书 名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乐

著 者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 者 郭英剑等

责任编辑 周晓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5 插页 2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640-6

定 价 25.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齐泽克文集

易碎的绝对

——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已出）

快感大转移

——妇女和因果性六论（已出）

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

——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已出）

（与拉克劳和巴特勒合著）

敏感的主体

——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已出）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

——政治因素的享乐（已出）

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已出）

幻想的瘟疫（已出）

与齐泽克对话（已出）

责任编辑 周晓阳
封面设计 许文菲

斯拉沃热·齐泽克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他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被一些学者称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他曾任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许多知名高等院校的访问教授，活跃于各种哲学、精神分析和文化批评国际学术讨论会，所到之处几乎都引起广泛的注意。詹姆逊说他“发出了一种不平常的声音，我们将在今后数年内反复聆听”。伊格尔顿评价他是欧洲近十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第二版前言：独自在理性范围内享乐

有一些哲学书籍(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理论》[*A Theory of Justice*], 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的《使之清晰》[*Making It Explicit*])虽然不够经典, 却很有名气, 常常被人参阅; 这些书几乎没有人真正认真地一页页读过, 但却是交互被动性(interpassivity)的范例。在这些范例中, 人们认为他者(the Other)的某种符号应该为我们解读作品。我希望我的这本《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能够有人真正地读, 从而躲过那些书籍的厄运。虽然两年前的第一本书, 英文版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更受欢迎, 但我始终以为, 这本书的成就远远超过前者: 因为这是一本理论性作品, 不像《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的一系列逸闻趣事和电影脚本那样不系统。每一位读者的反应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如果有人说: “读过《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那些精彩内容之后, 再读这本书令人感到有些乏味, 有些失望,” 那么, 我认为他显然没有理解这两本书的核心论点。迄今为止, 我的态度仍然是: 不想谈论《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一书的读者, 对《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同样应该缄口不语。

通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艰难之旅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这本书有一附加的特点使其至关重要：即它与《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产生了一种批判性的距离。虽然我一直坚持《崇高客体》中的基本观点，但现在却清楚地认识到其中存在着一系列相互交织的缺陷。首先，书中存在着哲学方面的缺陷：该书基本认同拉康的准先验的(quasi-transcendental)阅读，即认为实在界(the Real)的概念是不可能实现的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这样做，就为颂扬失败开辟了道路：即认为每一个行动都将以失败告终；勇敢地接受失败是值得颂扬的恰当的道德姿态。《崇高客体》没有能够处理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Real-Imaginary-Symbolic)三位一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整个三位一体的特点分别反映在了每个成分之中。

实在界(the Real)有三种样相(modalities)：其一为“真实的实在界(real Real)”(例如，令人望而生畏的那物[Thing]、原始客体、从艾尔玛的喉咙[Irma's throat]一直到外星人等)；其二为“象征实在界(symbolic Real)”(是指具有连贯性的真实体[the real]：蜕变成毫无意义的公式的能指，就像量子物理学公式一样，永远无法重新诠释生命世界(life world)的日常生活体验，或与之产生联系)；其三为“想象的实在界(imaginary Real)”(例如，类似我什么都不知道[je ne sais quoi]的神秘话语；超凡特性借以通过普通客体表现出来的高深莫测的“某事物”)。¹ 因此，实在界实际上是同时存在的三个向度(dimension)：是破坏每一个连贯性结构的深渊旋涡(abyssal vortex)，是现实(reality)被简化为数学公式的连贯性结构，是脆弱的纯现象。同样，象征界也有三种样相(其一为

真实体[the real]——蜕变成毫无意义公式的能指；其二为想象体[the imaginary]——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符号”；其三为象征符号体[the symbolic]——言语(speech)及其有意义的语言；想象界也存在为三种样相(其一为真实体——确切地说，是指占据实在界的一种想象梦场[imaginary scenario]；其二为想象体——具有仿制体基本功能的意象[image]；其三为象征符号体——仍然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符号”或新时代[New Age]原型)。²

那么，实在界是怎样铭写在语言之中的呢？罗伯特·布兰德姆³已经详细阐述了人类是语言行为规范的生命体这一事实的种种后果：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承诺(commitment)的媒介(medium)——每个陈述(statement)不但明确表述行动，而且要求我对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提供依据。也就是说，人们的行动并非只是遵循某种方式；他们还必须证明自己行动的正当性。按照拉康的观点，可以这样来总结一下，在无情的自然实在与人类特有的规范承诺符号性宇宙之间，还存在有其他事物：即自由的深渊。拉康在19世纪50年代指出，对于“你是我的老师”这样表述行动的陈述来说，因其失去了直接因果关系，我们被迫承认没有任何人真正了解或者直接洞悉他人的心思。⁴难怪人们在即将进行结婚宣誓这种重要承诺时，通常会感到焦虑不安：他会想，我真的为承担这份责任做好准备了吗？人们常常通过只是(假装)不认真对待这个承诺来排解焦虑：我确实结婚了，但我还要幻想着自己仍然是“单身”，而且，我还要骗过自己的配偶。

但是，结婚誓词确实强加给了我责任和义务：即使我在婚姻上有越轨行动时，我也会做得隐秘，避开大他者(big Other)的公众凝视(public gaze)——即使自己私下把婚姻当作儿戏，但在被迫公开婚姻危机时，我的整个生活都将变得一塌糊涂(这位人所共知的丈夫对情人许诺要和他妻子离婚，但却无限期地推迟，其

实他不只是伪君子,而且是某种象征性责任力量的活生生的例子)。正是那些确实把结婚誓词当真,把它看作一种全面承诺的人,才会产生很焦虑、很勉强的心里。而布兰德姆的作品却忽略了这个方面:拒绝承担全部责任,而且无力全面承诺承担责任,这不仅仅是一个经验心理学事实,也是一种铭写于主体与它的符号表征/认同之间的心理表征(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最基本关系之中的一种抵制。

这种空隙(gap)并不仅仅存在于语言之外,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语言与其外在一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在其不能简约的(自我)反思([self-]reflexivity)的掩盖下,铭写于语言的核心之中。拉康一再陈述他的“不存在元语言(meta-language)”的观点,这种观点并非是指不可能与某第一层面语言之间保持反思的(reflexive)距离;相反,“不存在元语言”的实质则是语言不存在——所有浑然一体的语言都会被能述(enunciation)立场的反思性铭写所破坏。这样,我们就又一次遇到了一个非所有性(non-All)的悖论:正是因为语言是“非所有”的,因为在语言能述过程介入所述的破裂关系掩盖之下,语言的局限性被铭写入了语言本身,所以没有语言的(元语言)例外情况,我们不可能从外部立场来谈论语言。语言就其概念本身而言,与其字面意义差距最小——这不是指在某种不能简约的意义模糊性或多向歧义性这个层面上差距很小,而是在更精确的意义层面上,即“他说X,那么如果他的真正意思恰恰相反,会怎么样呢?”这个层面上——正如公认的大男子主义者的女性观一样:他们认为女性逢遇性挑逗或性骚扰时,嘴上说:“不要!”,而其真正的含义却是“要”。

这里的关键点是,弗洛伊德著名的关于里比多的姿态情感矛盾的观点,与某种心理或生理情感的波动毫无关系,而是认为字面意义与潜在意图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空隙(gap)。这种反思性的

最小结构，正如诗歌中采用的重复修辞手段一样。假使我说“窗户”，那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名称；但是，就在我说“窗户……窗户”的那一刹那，一个空隙就把这个词语与其自身分开了，而诗文的“奥妙”正是在这个空隙中回响。有关“言语的诗韵根源”的陈词滥调的真理，就是说一个语词(word)从不单独出现：重复现象总已(always-already)回响其中。洞察这种自我反思与失败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在出现“失常”，情况进展不再顺利时，反思性就会转向自我意识。语言的自反性，即言语行动总是反过来评价自身，它的自身限定的事实（在这个名称的两个主要意义方面），证明了被铭写入语言核心的不可能性：即其不能捕获实在界。

一般人认为，我们自己作为旁观者，永远不可能真正确切地理解正式的宗教仪式的含义。因为只有那些直接生活在该宗教仪式所根植的生活世界中的人们，才能把握其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不是反思性地“理解”该仪式，而是直接“生活在”其意义之中）。按照拉康的观点，人们应该进一步断言：即使那些参加宗教仪式者的信仰，也终将是受仪式自身产生的离奇的里比多影响而“理性化”。这种空隙并非存在于直接参与此事的局内人和处于解释立场的局外人之间——而应该存在于事物自身。也就是说，空隙从参与者自身内部分离出来，因为为了能够保持仪式本身存在的实在界，参与者需要对其意义进行“理性化”。2001年9月11日的世贸大厦袭击事件说明了同样的道理：袭击所传达的关键信息，并不是什么更加深刻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蕴涵在最初的创伤后果之中：它提醒人们，恐怖主义起作用；我们能得到。

沿着同样的思路，我们可以把心理分析基本的解释方式，理解为不是要比表面解释“更深入”，而是要专注于扑朔迷离的最初印象。一般说来，第一遍阅读往往具有欺骗性，只有通过再次阅

读才会理解其意义——但是，假如第二次阅读所理解的意义，基本上是对第一次阅读震撼的一种防守阵式，情况会如何呢？例如，T. S. 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关于艺术及宗教现象的大量不连贯材料构成的坚固组织，是和一些日常生活片断(fragments)交织在一起的。而这正是该诗所传达的“信息”(message)。⁵ 这种“被异化的”当代日常生活片段，与大量令人困惑的形而上学材料之间的捷径就在它自身。对于艾略特而言，这就是对我们当今所处位置的最佳诊断：因为缺乏坚实的宗教—玄学根基，我们的日常生活退化为空洞、庸俗的社会仪式。如果我们能够跨越这个门槛，努力在大量令人困惑的材料中(艾略特是个佛教徒吗？他是否传播异教徒有关复活的神话?)辨别出一个和谐坚固的精神大厦，那么，我们就已经错过问题的实质了。

这就意味着，实在界并非是抵抗虚拟化(virtualization)实在的坚固核心。休伯特·德雷弗斯(Hubert Dreyfus)把我们当今生活经验的虚拟化的基本特征，定位为一种阻止任何全方位投入的自反性距离，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就像在互联网上玩性游戏，你永远不会承担全部义务，因为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如果玩不好，我随时可以离开。”一旦陷入僵局，你可以说：“好吧，我不玩了，我要退出，我们再开一局吧！”——但是，退出游戏这个事实说明，你从一开始就莫名其妙地意识到，自己可能会退出游戏，也就是说，不承担全部义务⁶。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真正受伤害，不会受到致命的伤痛，因为总是随时可以摆脱责任和义务；然而，在毫无余地的存在的承诺(existential commitment)之中，一旦出了错，我们就会全军覆没，毫无退路可言，就没有说“OK，我们重新开始吧！”这样的机会了。如果我们把它视为一种冒险的唯意志主义者跳入固执己见的姿态，那我们就误解了克尔恺郭尔(Ki-

erkegaard)^①和其他哲学家称作完美存在的承诺的内涵了——我们似乎非但没有坚持完全合理的怀疑态度，反而好像不知所措，竟然完全承担起承诺来了。克尔恺郭尔的意思是，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能退后一步从远处来对此情况进行判断——我们没有机会进行选择或不做选择，因为退出选择本身，已经是一个（不好的）选择了。

然而，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从根本上对两种人之间的对立（opposition）进行质疑，德雷弗斯的观点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第一种人是一个完全具体化的行动者（agent），他/她被迫置身于自己的生命世界之中，在永远无法被具体表现（objectify）/说明（explicate）为一套规则的预先理解的坚固背景之中采取行动，第二种人是生活在一个完全由规则调节的人造数字宇宙之中，因而就缺乏生命世界背景的坚固性。假如我们在生命世界的特定位置并非终极的事实，那又会怎么样呢？弗洛伊德关于“死亡驱动力（death-drive）”的概念，精确地把问题指向了抗拒完全沉浸于生命世界的人类主观性的向度；也清楚地指出了一种盲目的坚持，但对我们现实的生命世界的需求置之不理。

在塔尔科夫斯基（Tarkovsky）的《镜子》（*Mirror*）中，其父阿列谢尼耶·塔尔科夫斯基（Arseny Tarkovsky）背诵了自己的诗句：“没有躯体的灵魂是罪恶的/正如没穿衣服的身体。”——没有计划，没有目的；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语。“死亡驱动力”就是那个不能附体的灵魂，一种无视实在羁绊的纯粹的执着态度。因

① 克尔恺郭尔：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先驱，反对黑格尔的泛神论，认为“真理即主观性”，哲学以上帝为归宿，研究的是个人的“存在”，著有《非此即彼》、《人生道路的阶段》等。——译者注

此,诺斯替教(Gnosticism)^①有其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它的正确性体现在,它声称人类主体在我们的现实之中并非真正的“自由自在”;而它的错误恰好在于,它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上述原因,就应该存在着另一个(来自于星球、太空等的)宇宙,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当初我们是从那里“坠入”这个毫无生气的物质现实之中的。这也是所有后现代—解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对有关主体是如何总已(always-already)被移位、去中心及多元化等不同观点不知何故错过了问题的核心内容的地方:因此,它只是这个宇宙结构中的某一彻底移位、伤口或切口的名称而已。所有的认同(identification)终究只是无数治疗这个伤口的失败性尝试。这种移位本身就预示着整个宇宙,费尔南多·佩索亚(Fernando Pessoa)的一首名为“烟草店”的诗中的前几句最能表明这一点:“我为虚无(nothing)/我将永非任何物/我不能奢望为虚无/而且,我拥有了世界所有的梦。”

在德雷弗斯借以陈述其观点的对立空间中,实在界等同于不可蜕变为另一个数字图形的物质——物质—肉体层级(material-bodily level)/活生生的实在(reality)的惯量。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介绍一下拉康关于实在界与实在两者区别的一贯观点:他认为,在实在和魂魅幻象对立之中,实在界确实以一种“非真实”的形态出现,作为我们在符号建构的实在中没有空间容纳的魂魅幻象而呈现出来。在这个(我们所理解为我们的社会的)实在的符号性建构(symbolic construction)中存在着复杂情况:从我们体验

① 诺斯替教:初期基督教的一派,尊重某种灵的直觉,含有西亚、东亚哲学,曾被视为邪教,融合多种信仰的通神学和哲学的宗教。主要盛行于2世纪。它迫使早期基督教会为了反对它而汇成正典《圣经》,提出教义神学,建立主教制,从而获得发展。正统基督教强调信心,而诺斯替教则注重“诺斯”(神传知识)。——译者注

为实在中排除出来的没有活力的剩余部分，在充满鬼怪幻影(spectral apparitions)的实在界中又复活了⁷。

为什么像虾、蟹、贝壳、蜗牛和乌龟之类的动物有些令人惧怕呢？事实上，真正令人反感的不是一个里面没有粘液身体的空贝壳，而是那个没有外壳的“赤裸”身体。这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总倾向于把贝壳同它内部活生生的身体联系起来，总是认为它太大、太重、太厚了吗？永远不会有一种完全适合贝壳的身体；而且，这个身体似乎同样也缺少任何可以授予它哪怕一点点稳定与坚固的内部骨架：一旦被剥去外壳，里面的身体几乎就是无形状的海绵。在这些情况下，人类特有的易受伤害性、特有的对家庭港湾的需求心理，似乎应该追溯回本性⁸及动物王国来考虑——换句话说，这些动物就好像是带着房子行动的人们……这些柔软的身体难道不是实在界的完美形象吗？这种没有内在鲜活身体的外壳就像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著名的花瓶理论：它是描绘真实物(the Real Thing)实在的结构外形、核心的虚空(the Void)的象征性框架——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个外壳里仍然“有某些事物(something)，而不是什么也没有”——尽管这些事物不合时宜，但它是一个有缺陷、易受伤害、荒谬而不能令人满意的身体，是失去的那物的残余物(remainder)。因此，实在界不是我们直接沉浸于生命世界的前反思的(pre-reflexive)实在，而是那些迷失的，主体为了沉浸于这个生命世界而被迫放弃的——因此又以魂魅幽灵的伪装回归的事物。

因为《崇高客体》忽略了客体的这一荒谬的不合时宜性，客体就始终被限制在安提戈涅(Antigone)^①自愿接受死亡的形象化纯

① 安提戈涅：底比斯王俄底浦斯之女，因违抗禁令而自杀身亡。——译者注

粹欲望的道德规范之中了：她飞身扑向那物的那一刻，就被那物的光芒灼伤。我们目睹了这一自焚壮举，看到她那崇高的美荡漾在致命那物的附近。这是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①最后的诗篇中清楚描绘的那一幕迷人的女性姿态——如同凤凰复活腾飞的姿态，将尘世所有沉重的负荷抛在身后。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特德·休斯(Ted Hughes)^②和(诅咒他杀害了西尔维亚的)他的女权主义对手是如何对普拉斯的最后诗篇持相同的观点的。而在这一点上，杰奎琳是完全正确的：

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一种先验(transcendence)的意象——即诗歌、心理及政治的形象——在这种意象中，普拉斯最终从中脱离出来，通过燃烧自己把自己解脱出来，不管她受到了什么样的束缚(对休斯来说是虚假的自我，对女权主义来说则是休斯本人)。这个自我(同其他人、其他的诗歌)进入无对话(no dialogue)状态——同时，也摆脱了所有其他的事物，还有任何同自身有关的任何他性(otherness)；它摆脱了语言和世界的虚饰。⁸

这位英勇的贞女奇迹般地摆脱了禁锢，在死亡中实现了最终的圆满——这是作为欲望能指的阳具；拉康说：与拥有“阳具”(phallus)的男性不同的是，女性就是“阳具”，他的意思就在于此。⁹难怪特德·休斯——一个“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者”(phallogocen-

① 西尔维亚·普拉斯(1932—1963)：美国主要现代诗人之一、小说家，作品中着重描写精神错乱、死亡、自我毁灭和自杀等主题。——译者注

② 特德·休斯(1930—1998)：英国桂冠诗人，美国白派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丈夫。——译者注

trism),如果曾有这样一个人的话——赞赏普拉斯的自杀壮举:在这种(突破男权象征秩序)的突破行动之中,“阳具”以其对立面形式“呈现”出来:即以女性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个女性的幻想层(the fantasmatic)的形象,把三个相互之间不可调和的特征结合在了一起:纯真少女、母亲及凶残吞噬男人的女谋杀者。这里的确切意义就是,《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隐含的道德立场集中在安提戈涅这个人物身上,依然是“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

这种哲学缺陷与自由民主党政治姿态的剩余物密切相关。《崇高客体》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和“纯粹的”民主赞扬之间摇摆不定,其中包括对因循克劳德·勒夫特(Claude Lefort)观点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批评。通过多年努力的探讨,我才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危险的剩余物(remainders)是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上:澄清了我对黑格尔的拉康式阅读、对行动概念的细致探讨以及对民主这一观念持有明显的批评的距离。

从能指的逻辑……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一书前半部分详细探讨的基本观点,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拉康的“能指逻辑”,我认为这两者是对同一母题(matrix)的不同解释而已。那么,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这种观点还与什么有关联呢?

在《我们如何变成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一书中,¹⁰凯瑟琳·海勒丝(N. Katherine Hayles)试图向我们说明的是:索绪尔—拉康基于显在(presence)与不在(absence)之间对立的能指的概念,在数字世界中如何不再有效。在我和“稍纵即逝的能指”打交道的数字世界里,这些能指缺乏书写符号的实

质性存在,因为它们仅存在于屏幕上不断闪现的状态中,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全新的再创造:“是不断刷新的意象,而非一成不变的铭写形象。”¹¹ 这些能指以逃避索绪尔逻辑的方式在起作用:它们既显在又不在,以虚拟状态闪烁在屏幕上,而且容易受到那些能够在片刻之间改变它们地位的操作影响(鼠标轻轻一击,就可以将其删除或改变其顺序……)。这里的组织原则(organizing principle)不再是显在/不在,而是模式化/随机性(Randomness)——也就是说,它是在不断地随意性变化中对某种永恒模式的一种认识。结果,那些奠基象征性秩序的“消极”经验同样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有“象征性阉割”,即为显在/不在相互影响开辟空间的不在的引入,而是带来了突变:“模式破裂得如此剧烈,以至于永远无法再维持连续复制的希望。”¹²

然而,这种“符号矩阵(semiotic square)”的阐释(显在/不在;随机性—模式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就像海勒丝隐约暗示的那样,索绪尔的显在/不在差别性(differentiality),同物质(肉体)层级的显在/不在绝非一回事;所以,在她把“本质相对抗的文本”与虚拟的电子图像作为对立体时,她忽略了能指秩序总是最小程度理想化的方式——也就是说,显在/不在的结构为何也是那种能够通过不同的媒介得以物质化的差别性关系的一种“模式”。那么,这个模式与海勒丝的模式概念有何不同呢?在完全差别性中:能指恰恰就是同其他能指之间差异的总和。然而,与此相反,就在我们直接辨别/推论一种模式时,差别性却不起作用了——用拉康的话语来讲,这就是为什么对立模式或随意性绝非是尾随能指的显在/不在而来的,而是限定想象秩序的内容:这种对立不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Theory)的全部要点,即主体能够在变换过程的多样性中推论出同一模式呈现的方式。